

虎林文史資料

第四輯

(内部发行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虎林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九年十二月

目 录

血泊重生·····	王吉厚 (1)
李象山其人·····	文 羽 (15)
虎林县的土地改革运动·····	刘翰章 (26)
永平村土地改革运动纪实·····	杨 野 (36)
毕于民在虎林抗日活动片断·····	李连生 (43)
王乃武参加抗日联军始末·····	范振义 (48)
九牌战斗·····	刘 焘 (53)
陈春树在虎林抗日的一段经历·····	范振义 (57)
关于日军虎头地下要塞的设施·····	王悦林 (62)
虎林早年的土匪·····	刘翰章 (66)
日祸匪患紧相连	
同和村百姓苦不堪言·····	杨 野 (71)
关帝庙的“郑疯子”·····	李连生 (76)
虎林的私营商业·····	刘翰章 (87)
回忆解放初期的虎林师范学校·····	高文卿 (94)
为抗日联军送军粮·····	刘翰章 (97)
日本鬼子搞归屯并户	
黄泥河百姓两次遭殃·····	杨 野 (100)
虎林县的鸦片种植与吸食·····	刘翰章 (104)
虎林县开发建设过程中人口变迁·····	高心峰 (108)
匪患深重的于家沟·····	杨 野 (111)
苏联红军攻占日军虎头阵地略记·····	范振义 (115)

日本鬼子扫荡秃顶子山抗联密营……………高心峰（ 118 ）

日本鬼子屠杀抗日官兵……………范振义（ 120 ）

抗联小战士

——记张树林少年时代参加抗日

活动片断……………刘 焘（ 122 ）

西霸天王福堂欺压百姓二三事……………范振义（ 127 ）

攻打西岗救劳工……………刘翰章（ 130 ）

血泊重生

王吉厚

1980年前，我在虎林县虎头区工作的时候，就认识了郝锡孔这位惨遭日寇残害，在血泊中重生的老人。那时，他在富路二队猪场当饲养员。在我俩的一次偶然的闲谈中，他向我倾诉了那段炙人心扉的经历和灾难，使我凄然泪下……十年过去了，我听说他已搬迁到县月牙良种场居住，承包饲养县人防办的两头奶牛。1989年4月，在冰雪消融，万木复苏的早春时节，我专程去访问了他。他虽然已逾耳顺之年，但仍然身板硬朗，走起路来步履矫健，说起话来，声音宏亮，那满头银发，虽然飘走了他那些逝去的年华，但那深邃的眼睛和炯炯目光，却充满了他对新生活的无比热爱和希望。当我简短的说明来意之后，老人紧握着我的双手说：“感谢党，没有忘了我！感谢同志们！”我的采访由此开始了。

我叫郝锡孔，今年65岁，土生土长在虎林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。清冽的乌苏里江水，象妈妈的乳汁，滋养我长大成人。我父亲叫郝九峰，祖籍山东烟台，1920年到虎头对岸伊曼城经商，1924年回到虎头。我母亲叫伊莲娜，是俄罗斯人，她是一位饱经风霜、善良、温顺的女人，毅然跟我父亲来到异国他乡。由于我这样的血缘关系，从小就令人瞩目，心灵上也便深深地印下了这块命运的疤痕。

1931年，我8岁的时候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“九一八”事变，很快将魔爪伸到虎林。从此，我和灾难深重的东北同胞们一样，惨遭奴役。14年的悲惨生活，14年的血泪深仇，我永生不忘。更使我切齿痛恨的是1945年8月，在侵略者末日来临的时候，又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。他们屠杀了我们一起勤劳奉仕的伙伴，用刺刀戳穿了我的胸腹，刺伤了我的喉咙，砍伤了我的头颅，使我两次倒在血泊中。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，我就愤恨不已。我是千千万万惨遭日本侵略者杀害的中国人民的一个历史见证，我要把我的悲惨经历诉诸后人，留给人类，以便引起人们的深思，让子孙后代永远不忘先辈们所遭受的苦难，激励他们更加热爱今天，热爱祖国，热爱和平。

我永远忘不了日本侵略者将侵略魔爪伸到虎林的那些日日夜夜。那是1933年的秋天，我刚满10岁，日本兵进了虎头，张牙舞爪，不可一世，日寇所至，人心惶惶、鸡犬不宁。那天，我父亲领着我到江边的沟趟里躲避，可是躲了今日，躲不了明天，天傍黑时又回到了虎头。日本鬼子进虎头之后，天天召集民众训话，蛊惑人心，宣传“日满协和”、“共存共荣”，要在满洲建立所谓的“王道乐土”。谁要不到会，就打嘴巴，有时还让来晚的人互相对打，这叫“协和巴掌”。你不使劲打，日本兵就打你，直到你用劲打对方才算拉倒。更为残忍的是日本兵抓住一位开会不到又有反满抗日嫌疑的人，来个杀一儆百，硬是把那个人砍了头，塞到乌苏里江的冰窟窿里了。日本侵略者的暴行。我看在眼里，刻在心上，深深地埋下仇恨的种子

在学校，我念的书本上也充斥“日满协和”的陈词滥调，渗透了日本的奴化教育。日语课比重很大，字里行间都在向学生灌输“武士道”精神。1937年，我14岁从国民优级学校毕业就不再求学了。父亲给我找了临时营生，为一家日本糕点铺挑水，店址就在现今虎头粮店附近，掌柜的是个很吝啬的日本女人。水井在如今虎头渔场办公室的位置，我要翻过两道大沟，才能把水挑回来，在我那个年龄是相当吃力的。报酬却极其微薄，只是给我一些残次的碎糕点。15岁那年，父亲又托人把我送到乌苏里旅馆当博役，什么活都干，如：刷地板、擦玻璃、打扫房间卫生等等。掌柜的也是日本人，长了一脸大胡子。有一天来了一个日本军官，喝得酩酊大醉，住进旅馆。不曾想，第二天那军官说他的钱丢了。因他的房间由我负责，我曾去擦过灯罩、点过灯、送过水，于是怀疑到我身上。日本宪兵队立即将我传去审讯。宪兵们怒气冲冲地追逼我：“钱放哪去了？！”我说：“太君，我没拿钱！”宪兵呵斥道：“你撒谎！”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打起我来，这个一撇子、那个一脚，打得我头昏眼花，鼻口窜血。因为我根本没拿他的钱，任凭他们怎么折腾，我也不能承认。于是，有个宪兵说：“小兔崽子，你嘴还挺硬，不给你点辣的尝尝，你不知道利害！”他让我跪在地上，用竹批子打我，我的脊背上被抽起一道道血檩子，我仍然咬住牙关不承认。他们气急败坏地采取更毒辣的手段来折磨我。把我绑在一条木凳子上，给我灌凉水。先是用块麻布盖上我的嘴，随着我的呼吸用大肚子壶往我嘴里倒，由于嘴上盖着麻布，不至于呛着。他们一个劲地灌，我肚子胀得鼓鼓的，非常难

受。他们又用手按肚子，把水挤出来，然后再灌，经过这样反复折磨，我实在受不了啦，也只有屈打成招，说：“别灌了，别灌了，钱我偷了，放在杜家小铺我大姐那儿。”杜家小铺和我家很有交情，我这样连累他们，也实在没有办法。宪兵队用棉花将我的嘴塞上领我去起钱。见到在小铺卖货的杜掌柜的大女儿，我哀求说：“大姐啊，你把钱给他们吧！以前我家买东西的钱，都是我偷的，以后再还你。”杜大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有些不知所措。这时有个宪兵催促道：“快拿钱来，少费话！”杜大姐只好把钱交给他们，就这样，算我认了罪，把我押在宪兵队后院，宪兵队向上走公事，报到东安省法院。因我年龄小不够判，让我父亲取保释放。于是，我父亲到密山，找了一位朋友，把我保了出来。在密山吃饭时，我父亲认识了一位包修铁路的把头，当时和他说好让我去修铁路，一天一元钱，给把头两角，个人得八角。就这样，我又卖苦力修铁路，干了几个月。后来，我父亲又托人让我给虎头航空会社当博役。我有个叔伯哥哥叫郝洪基，为人倔强，有个警察看上了他的女儿，托人去求婚，他没答应，把女儿许给了老黄家，后来别人告发老黄家私通抗联，便把郝洪基株连进去，被宪兵队抓了起来，非刑吊打，折磨得死去活来。我有时偷偷给他送点饭，说两句话。有一天我嫂子问我：“你哥的事怎样了？”我随口答道：“听说更厉害了！”我嫂子听后不放心，去找大特务刘树堂求情，说话中露出了我的话头，刘树堂当即报告了宪兵队，说我泄露了秘密。金井班长把我传去，让我跪下，他脱下牛皮底拖鞋打我的脸，打得我满嘴流血。他边打边骂：“八嘎亚

鲁！你什么话的说了？”我说：“金班长，我没说别的，就说我哥哥的事更厉害了。”金井又把我打了一顿，随即说：“马的不用你喂了，滚蛋，滚蛋的。”这就是我第二次当博役的遭遇。

我21岁那年，按规定要我去作服兵役检查，由于血缘关系等种种原因，不符合国兵条件，被编进国兵漏。国兵漏即是挑选国兵剩下的人员，虽然不直接到军队服役，但也要为满洲国进行义务劳动，如修军事设施，开矿挖煤等等，美其名曰：“勤劳奉仕”。第二年，村里通知我到平阳镇修堤坝，平阳镇即今日的鸡东县所在地。所谓堤坝实际是反坦克壕，并行两条土埂，高三米，顶宽一米。1945年3月10日，我们虎林勤劳奉仕队300多人来到了平阳镇工地。三月份的天气还是很冷的，在茫茫的草甸子上，我们搭起了十多个窝棚，日本人用铁蒺藜把所有的窝棚都圈在里面。草甸子里积雪消融。四面八方涌来的桃花水，深的地方有二尺多，彻骨的凉。我们整天泡在水里、烂泥浆里，简直象只落汤鸡。晚上睡在又潮又冷的窝棚里。穿着湿了，也没有替换的，只有天天穿着湿靰鞡、湿衣服干活。活很累，主要是挖冻堡片、背堡片、挖土、挑土，从早到晚马不停蹄的干，监工还嫌慢。工地的伙食也很差，高粱米、橡子面，没有菜便煮咸盐豆吃，一天吃四顿饭还饥肠辘辘的。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干活，不少人累病了，日本人根本不给你治。怕传染别人，一病倒就抬到隔离室去。这样，命大的、身体素质好的就硬挺过来了，身体差的、病重的就被折磨死。有一天我弟弟来看我，临走扔下几个钱，我偷着同窝棚里的工友到附近的屯子里买了

点大米，其他窝棚的人也有去买的。我背着大米走错了路，转了一宿，直到天快亮了才回到窝棚，就听到干活的钟铛铛地响了，于是只得马上去干活。由于有了大米吃，不知谁将高粱米饭倒了，这下可激怒了日本人，他们便逐个窝棚搜查，把一袋袋大米摆在伙房前。等我们收工回来了，大队长训话，把我们臭骂了一顿，之后假惺惺地说：

“今后下不为例，你们各自认自己的米袋子。”当我们真将自己的米袋背起来时，大队长突然喊了一声口令——立正，放下米袋子向前五步走！然后让我们互相打协和巴掌。大家谁也不伸手，他急了，啪、啪，自己动手打了我们各两个嘴巴。

在平阳镇干了四个多月，总算把堤坝修完了。七月中旬，我们又被分到密山学习开汽车。不久，苏军出兵解放了东北。

1945年8月7日早晨祭庙时，有人说美军已进入日本本土。看管我们的日本人惶恐不安。说话间，只见天上出现两架飞机，开始我们以为是日本飞机，可是看见了机翼上的红五星后，日本人一个个吓得面色如土。这时，从密山开往虎林的火车头跑了回来，说是车站和许多铁路桥梁已经炸毁。大队部已经接到命令，要大家到牡丹江集中。我们勤劳奉仕这伙人，由于日本人封锁消息，不敢贸然解散，只有坐着汽车经勃利向牡丹江逃奔。天傍黑时，下起雨来，在雨雾中看到迎面黑压压的来了许多人，一问乃是从鸡西煤矿来的。听说话口音，其中还有虎林县人，他们说：“你们真傻，牡丹江那边乱得很，还是咱这边安全，快往回走吧！”这时，雨大路滑，我们都犹豫起来，偏

巧，汽车轮子一滑，歪到路边的沟里去了，我们都下车来推汽车，好不容易把车推出来，日本人催我们上车，不得已又上了汽车。这时，汽车正在爬坡，速度非常慢，我们趁机偷偷从后厢板爬了下来，钻进路边的丛林中。后来向路上行人一打听，虎林县的人已经顺火车道走远了。我们大失所望，只好慢慢地往回走。我们一共七八个人，虎林的人有我、于铁匠、孙庆才、郭守义等。走到七台河，我们分头去找地方投宿，我住在老杨家，听说我是虎林勤劳奉仕队的，一家人待我很好。第二天，我们要启程时，老杨一再劝我们不要走，怕路上碰到日本败兵惹麻烦。可是由于我们归心似箭，恨不得一步跨回家门，辞谢后，又踏上了归途。才过七台河桥，便碰上一伙伪警察拦住我们去路。无奈我们只好返回七台河，又住了三天。恰巧，我有个连襟是伪国兵，曾驻在密山知一，我在密山时去看过他。这时，他们的部队也转移到七台河，他告诉我们可随他们部队一起走。8月12日夜里，国兵起义，当场把日本军官击毙，决定回兵密山向苏军投诚。次日凌晨，我们跟着200多名伪国兵队伍，从七台河出发直奔二龙山。13日中午，当我们登上第一个山岗时，只见从远方飞来八架飞机，在我们头上盘旋，连长马上扯出一条白毛巾在头上挥舞，以示投降。有些国兵也按连长的做法，高举白毛巾在头上摇动，飞机很快向远方飞去。又走了10多华里，在勃利、密山、宝清三县的交界处，遇上了来自宝清的伪国兵部队，大约有300多人，同我们会合一起。人多了，大家很高兴。两方面的头头正在商量向苏军投诚的办法，不料，苏军的飞机又来了。没等我

们挑起白旗，只见一架飞机一个回转身俯冲下来，机关炮突突地向我们扫射起来，另一架飞机就势扔下一枚炸弹，这时，我们500多人乱了营。尽管国兵头头们很快挑起了白旗，但那8架飞机仍发疯似地轮番向我们扫射、轰炸，机关炮不停地呼啸，炸弹“轰轰”地山野里开花，霎时间，整个山沟，浓烟滚滚。我们这500多人哭的哭，叫的叫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炸飞的尸体挂在树枝上。我们七八个人钻到一台日军遗弃的破汽车下面，就这样，经过苏军飞机的猛烈袭击，有的趴在大树下，有的倒在沟塘里，有的匍匐在草丛中，整个部队都七零八散各奔一方。我呼喊着重伙，顺着沟塘又蹚过水甸子，尽管怎样呼喊也没找到我的连襟。我们又重新组合了六个伙伴，其中虎林的有两位，我和一名国兵的班长；密山的三位；还有一位是家住吉林的国兵，因一时不能返回吉林，要求同班长一起到虎林。天黑后，我们六个人奔到一座日本开拓团住过的小房子里，在屋角找到一袋大米，自己动手做了一顿饭。这一夜，我们就睡在开拓团的土炕上。

8月14日，我们从小房出发，刚上公路不久，就看到路边停着一辆日本汽车，从车牌上看好象是哪个株式会社的，被苏联空军打瘫在这里。车上有饼干、水袜子、火柴等，我们各拿了些饼干、火柴，换上一双新水袜子又上路了。路上，我怕再碰上苏联飞机惹麻烦，提议白天休息，夜间走路。王班长说：“咱们看情况行事，随机应变吧，早走早到家。”于是我们又走了五六里路，忽见远处隐隐约约有几匹马在那里，我们误认是昨天被苏联飞机打散的国兵伙伴，快走几步迎了上去。原来是一小股日本部

队。赶车的老板被日本兵挑死了，侧身倒在一棵桦树下。日本兵一个个瞪着血红的眼睛逼问我们：“干什么的？”我们回答是勤劳奉仕队回密山的。日本兵上前搜查我们，王班长带的一支匣子枪被日本兵缴了去，把我们每个人都搜查完后，那个日本军官气哼哼地说：“你们不是勤劳奉仕的，是苏军的先导，是苏联间谍。”不容我们分说，一声令下，把我们押到一个沟坡下监管起来。另一个日本军官不知从哪拿来一些日本窗帘布，把我们眼睛蒙上，把我们双手倒背着绑在一起。这时，我们六个人预感到问题严重，日本兵如此举动，是绝对没安好心的。我们几个人想往一起凑，日本兵硬把我们分开。我们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忽听到一名日本兵报告说：“从密山方面追来的苏军，就要上来了！”日本兵闻讯后都慌张起来，只听“哈牙苦！哈牙苦！”的直叫。我们由于被蒙着双眼，什么也看不到。大约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，几个日本兵押着我们往塔头甸子里走，塔头墩子一个挨一个，绊的我们直摔跟斗。这时，我感到不是好兆头，怕是要处决我们吧？不然怎会往塔头甸子里走呢？我突然想起我的母亲、妻子，他们在遥远的虎林，怎知道他的亲人就要死在这苍茫的荒野……日本兵突然喊口令让我们停下，只听噗哧一声，前边的伙伴哼了一声便栽倒，接着第二个、第三个，夹着声声咒骂、声声惨叫，以及刺刀别肋条骨的喀嚓声，我清楚地知道我们遇难了。我走在最后，也是最后一个被刺的。我只听噗哧一声，腰后一阵巨痛摔倒在塔头空里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我苏醒过来，只觉得两个膀子酸

痛，一动也不能动，原来两手还绑着，想翻一下身，也翻不了。这时更感到后腰剧烈地疼痛。我咬着牙，慢慢地勾动手指解手腕上的布条，不知费了多大的劲，歇息了多少次，终于解开了。我先将脸上的蒙布除掉，看到天还没黑，又感到舌头很麻，嘴里有血块子，我就慢慢地向外吐。低头一看，满身是血。一摸后背有个很长的刀口，再看前胸，已被刺刀穿透了腔，前后刀口还往外渗血，衣服全被血浸湿了。这时，我又感到头很疼，再一摸，头发粘糊糊的，头顶上也有个刀口子。我想，这可能是在我挣扎的时候，日本兵又朝我头上砍了一刀。趁天还没黑，赶忙去看被刺的其他伙伴。我慢慢地爬到他们身边，解开他们的手，扯下他们的蒙眼布。摸摸他们的身上，个个冰凉冰凉，早就停止了呼吸。我跪在那给同伴们磕了个头，祷告说：“你们安息吧！请保佑我能回到虎林，给你们家里报信！”身负重伤的我，怎么走呢？茫茫原野，哪是归途？但不管怎样，我要活，我要活下去，活着回虎林。我坚定信心，振作精神，开始向公路移动。不知爬了多长时间，我爬到路边停汽车的地方，从地上捡了几小包饼干，喝了一些路边沟里的水，从汽车上又扯下一床毯子，又爬了一段路，实在爬不动了，眼前已是一片漆黑，我便把毯子搭在一棵歪倒的柞树上，钻到毯子下，一宿半昏半睡。

第二天，天刚放亮，我又继续往前爬，爬爬、停停，奔我们头一天来时经过的那个日本开拓点，想在那里养好伤，早日返回虎林，傍晚午时，我总算爬到了那里，房内空空的，大米早不知被谁捡走了，我到菜园里薅了几根葫萝卜吃了，然后倒在炕上休息，伤口隐隐作痛，因失血过

多，脑袋也昏胀胀的，不知不觉进入梦乡。在朦胧中，我听屋外有噗通、噗通的声音，睁眼一看，院子里进来三头大奶牛，其中一头乳房膨胀得很大，看来已好几天没有挤奶了。我高兴地上前，用草绳子把那三头奶牛拴住，然后找来一只日本兵饭盒撸起奶来，接着我又生火，把饭盒支起来煮奶。就这样，我饿了便喝奶，伤口疼了用牛奶洗，经过七八天时间，我的伤口虽未愈合，但也未溃烂，身体也慢慢地有所恢复，是这些奶牛救了我的命，使我总算活了下来。

8月22日早晨起来，看到菜园里有两个人在挖土豆，不一会儿，两人进屋，劈头便问我：“你是从哪来的？在这干什么？”我如实的把我的遭遇向他们诉说了一遍，看样子并未引起这两个人的同情，他们麻木不仁，一直用仇视的眼光看着我。临走告诉我，牛是开拓团的，他们要牵走。我以商量的口吻说：“三头奶牛给我留下一头吧！”我上前拉一头出奶较多的奶牛。有一个身后别着小斧头的家伙厉声说：“不行！一头也不能留！”那个拉牛缰绳的人也翻脸补充说：“再啰嗦，砍死你！”我伤重体弱不敢同他们较量，只好松了手，眼睁睁地看他们把奶牛牵走了，我再也喝不上牛奶了，只挖些土豆煮着吃。我也不能在此久留，便又到另一个开拓团的据点去。我挨门逐户的寻找食物，找到了一些大米，油、盐、酱、醋，自己又搭了个铺，打算再住几天，可是当我又到一间空房去捡东西时，遇上一个胳膊上戴红袖标的人，他听了我的诉说，动了怜悯之心，热情地对我说：“跟我走吧，我想办法让你回虎林。”他赶着两匹日本马，拉着不知从哪弄来的两轮破车，让我

到车上坐。车一颠簸，我的胸腔疼痛难忍，于是我不得不下来慢慢地跟着车走，走一会儿、坐一会儿，来到了这位好心人的家。一进院子，把我造楞了：在宽敞的院落里，院西边圈着半院子大肥猪，一只只滚瓜溜圆；院东拴着十几匹高头大马。主人介绍说：“这些都是从开拓团那里赶来的。”中午，主人以大米饭炖猪肉招待我，我饱饱地美餐一顿。也就在这天夜里，这位好心人把我介绍给苏联红军。红军同志见到我的伤口尚未愈合，一时又找不到药，他们暂时用坦克油涂我的伤口，后来我跟着苏联红军来到七台河，他们找来军医为我医伤。由于我从小跟我母亲学过俄语，眼面前的话差不多都会说，因此，苏军让我当翻译，我也就欣然答应了。有一天，地方维持会的人报告，说是在一个日本开拓团的土围子里有数百名日军集结在那里，苏联红军决定去讨伐日军，七台河也有些人主动来配合苏军，当时我的伤势尚未痊愈，伤口时而作痛，加之失血过多，身体十分虚弱，走一段路就气喘吁吁。于是红军指挥官让我同战士一起坐军车去。当我们接近集结日军的村头时，只见村外有数十个日本学生乖乖地向苏军投降，苏军向他们宣传，要他们不要害怕，将来把他们遣返日本国。这时，我坐在后边的军车上，因先头部队里有苏联远东军区派来的翻译官，所以我也就没有下车。哪曾想，小学生投降，是日本人耍的花招，他们早已隐蔽在土墙后边等待时机。当一名苏军士兵攀着墙头向土围子里窥视时，日本人正在蠢蠢欲动。一个日本妇女端着一挺轻机枪架上墙头。霎时间，战斗打响了，日本兵蜂拥而出，苏联红军仓促应战。我坐的这辆军车上的苏军士兵一看形势不好，纷纷跳

下车应战，终因寡不敌众而败下阵来。由于我身上有伤，下车非常困难，只好躺在车上装死，冲上来的日本兵，见我躺在车上，朝我后屁股狠狠地刺了一刀，我只觉得骨头喀喀响，总算强忍过去了。有伙日本兵堆了柴草用火把车点着就撤了，我从车上爬下来，在烟幕中爬到树丛里。天黑后又爬了十多里路，深夜里又回到老杨家。苏军知道后，将我接到勃利野战医院治疗。第二天，据说又调集不少兵力，以坦克开路再次去讨伐日本兵。战斗非常残酷，但最终将日军全歼，苏军伤亡也很惨重。我在勃利医院住了三天，一件令我困惑不解的冤案降临到我的头上。苏军军事法庭一名军官来提审我，他说：“你要讲实话，日本人给你什么任务？你使苏联红军遭到如此重大损失。”我一听急了，说：“我是一个地地道道中国老百姓，被日本鬼子抓去勤劳奉仕，在返回虎林途中，我的五名伙伴在日寇的刺刀下丧生，我是死里逃生活下来的。你看，我两次被刺的伤口尚未愈合，苏联红军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么能是日本间谍呢！那天的战斗我因伤痛未下车，并未临阵逃脱给日本送情报……那位苏联军官冷笑一声说：“你撒谎，你这套把戏我在德国战场上见过不知多少次，你们都会玩苦肉计，有的德国人甚至将胳膊、腿砍掉来麻痹我们。这次战斗分明是你给日军报的信，我们上当了。”就这样，我被扣上日本间谍的罪名，判刑十年，押送到苏联伯力监狱，而后又转到西伯利亚监狱服刑，直到1953年12月释放，遣返回国才又回到了虎头。

我这桩冤案，是一次天大的历史误会。作为一名正直的中国人，我忍受了这些委曲和痛苦。在那多灾多难的年

月，是苏联红军用生命和鲜血帮助我们驱逐日寇，解放了东北人民，不能因为我个人的一点委曲而否认苏联人民的伟大功绩。我只希望人们从这些历史事件中，接受教训，激励后人。

回到虎头后，参加了农业生产，过了几年太平日子。万万没想到，又一灾难降临在我头上，“文革”中我又被打成苏特内迁勃利，蒙受屈辱……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我才得以彻底平反，重新过上安定、富裕的日子。